

基础教育阶段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问题、原因及其治理

杨小敏 庞丽娟 杨大伟 金志峰

【摘要】以“集团学校”“巨型学校”“大班额和超大班额”为典型表征的中小学校“大规模化”是基础教育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发展性问题。在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和教育改革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伴随学龄人口的向城性流动,“大规模化”主要以三种方式演进,呈明显的城镇化、组织化推进特点。其在发挥历史作用的同时所伴生的突出问题,影响区域教育和文化生态,制约学校内涵建设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倾斜下重点示范学校建设的带动、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的偏差、地方政府落实教育优质均衡的施政选择等主要因素,助推了学校“大规模化”的持续发生。未来,其治理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优质、均衡、特色和多元发展,通过观念转变、标准完善、科学布局等举措,促进中小学校回归到以适度规模为原则的内涵建设上。

【关键词】基础教育;学校大规模化;教育治理

【作者简介】杨小敏,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庞丽娟(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杨大伟,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湖北 武汉 430079);金志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摘自《中国教育月刊》(京),2023.9.60~67

一、现状: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发展以多种实践方式逐步展开

(一)指标可界定意义上的大规模学校和学校“大规模化”

普通高中阶段学校规模总体上较大,全国层面平均每所学校的教学班数量基本呈扩大趋势,2020年为35.5个,接近国家标准最多36班/校的规定值。而且,近六年平均每班学生数保持50人以上,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的最高规定值。具体来看,大规模学校主要集中在城区和镇区的“教育部门办”学校,平均每校教学班数量均超出了最大国家标准值36个,城区、镇区平均学校班数分别为40、41个,乡村则明显较小,为27.5个。

义务教育阶段,以2020年的截面数据看,全国平均水平上,初中学校教学班数量均值为20。^①教育部门办和民办学校平均教学班数量均在标准的规模值区间内,分别为20和26个,处于国家标准区间的较

大值位置。并且,呈现出从乡村到镇区再到城区,平均学校规模逐渐变大的分布特征。城区初中班数均值已趋近国家标准的最大值30,镇区初中班数均值也趋近国家标准最大值24。^②而且乡村和镇区民办学校班数均值分别为16和27,明显高于教育部门办学校。小学总体平均教学班数量为18个,处于国家标准区间的中上规模,并且也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区、镇区学校平均教学班数量较大,分别为33和23,相应超过和趋近国家标准最大值30和24。^③从时间序列看,在全国总体和分城乡分类型的意义上,城镇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规模基本上都呈持续扩大的趋势,而且民办学校更为明显,平均规模总体上明显大于教育部门办学校。

(二)中小学校“大规模化”的城镇化、组织化推进特点

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小学校在不同阶段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其他特定力量

的驱使呈现不同形态、速度、范围、程度、结果的“大规模化”趋势,总体呈现出城镇化、组织化推进的显著特点。

1. 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学校规模扩张

尽管城镇化表现出党的十八大以前“以乡补城”和之后“以城带乡”的策略差异^[1],但之于中小学的大规模化,一个明显的外在环境特征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和乡村人口的减少。^④城镇学龄人口总量和区域性数量剧增,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形成的学龄人口向城性流动^[2]直接导致城区和镇区基础教育学位供给严重不足。如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龄儿童依法就近入学,城镇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国家“两为主”的政策予以保障。对于地方政府和城镇学校而言,中长期举措就是规划和新建学校,短期的应急性办法就是改扩建学校、增加教学班数量和扩大班额容量,以快速满足与适应学龄人口向城镇集中的需求,城镇普通高中和义务教育学校的大规模、超大规模和大班额、超大班额现象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乡村小学、初中学校数量和规模逐年锐减。以2000年到2020年为例,乡村小学数量由42万所减少至8.6万所,教学点相应地由11万个减少到7.9万个;乡村初中(不含1千多所完全中学)由3.5万所减少为1.4万所(含0.57万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和4所职业初中)。

2. 以学位供给为核心的多种组织形态

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进程体现出应对城镇化的时代性卷入,目标在于满足城镇剧增的学位需求,传统优质公办学校或具有后发资源优势的民办学校是主体,在不同范围和程度进行区域性展开,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组织运行方式。一是单一学校主体扩大办学规模。城区优质学校实施空间容量、师资队伍、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有资源支持的优质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较为常见,直至出现了一批完全中学或K-12一体化“大型学校”“超大型学校”,教学班和学生人数远超国家适宜规模标准,形成在区县范围内一家或几家独大的格局。二是多个学校主体联合形成的“托拉斯”形态的学校集团。从自组织的松散型学校联盟发展到具有结构化组织机制的办学集团,特别是区域性“名校办分校”模式发展迅速。这一方式因能较快推动区域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政策性鼓励和支持。三是学校布局调整进程中乡镇中心校的建设及其与村小教学点的一体化管理。一些地方实行由具有教育行政职能的中心校,负责对区域内若干个乡村小规模学校进行人员和经费的管理,教育教学指导与教师培训等。其在本质上也是农村学校的“大规模化”。

二、问题:副作用凸显并制约学校内涵建设和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础教育迈入全面提高育人质量的新阶段。^[3]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城镇挤”和“大班额”为突出问题表现的学校“大规模化”,特别是一些城镇地区中小学校“滚雪球式”扩张和万人规模学校的出现,产生了学校管理上的诸多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区域教育生态,不利于新时代基础教育现代化向更高水平推进。

(一)师生互动不足而影响教学效果,工作过载加剧教师职业倦怠

在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和实践中,师生互动是一个关键指标。对于大规模、大班额学校,班级教学中高品质的师生互动难度较大,适用于小组和小班的启发式课堂教学难以开展。空间密集感会形成对教师互动式教学的心理压迫和情绪压力,抑制和削弱师生互动的积极性。缺少互动的课堂教学剥离了优质教育的内核,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另外,有研究认为教师分配给学生的教育关注度直接影响学生发展。对于同一教师而言,需要照顾的学生越多,给予学生的平均关注度就越低,每个学生相应的发展值就可能越低。^[4]大规模学校尽管教师总体数量相对较多,但单个教师所面对的学生数量也较大。课堂时间和教师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在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班级中,教师能够平均分配给每个学生较低的关注度。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多关照学业成绩优异或较差的学生,大多数表现中等的学生教育关照度更低。^[5]

学校较快速度的“大规模化”,往往伴随着优质教师资源的被稀释和教师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问题,在教学组织和学校管理层面容易导致教师工作负荷超载。^[6]学校和班级规模的过度扩大客观上要求教师需要承担超出其正常量的教学任务,如在县镇学

校学生规模急速扩张和师资紧张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教师教学工作负担加重。^[7]同时,规模扩大也引起非教学事务性活动的增加,使教师因材施教、创造性教学和专业成长、职业发展的空间被严重压缩,进而导致较为普遍的教师职业倦怠。

(二)规模扩张挑战学校组织管理,办学活动潜藏安全及社会风险

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表现为学生和相应班级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围绕教育教学活动的机构人员需求量的激增和组织结构的变化。由于组织文化的相对稳定性和学校内部治理能力提升的后继性与渐进性,就容易产生教育教学活动在组织和人事上的矛盾。比如兴起于20世纪末的“集团化办学”,作为中小学校大规模化的一种常见举措,已经发展出多种模式。^[8]但如何确保组织的有效运转一直是一个重大挑战,一方面在于“集团校”内部治理效能不足^[9],另一方面在于单一主体学校之间围绕自主权的管理职能受限和行为冲突。

学校规模过大意味着管理链条的延长,容易导致信息传播过程中执行力的衰减,极大地降低了学校的行政管理效率。^[10]而且,中小学大规模学校有很多为寄宿制,也更容易出现各类安全事故。在经费方面,由于大规模学校普遍存在校园的改扩建,造成一定时期内其基础设施建设、人员开支等经费需求大幅度增加,形成很多大规模学校的债务问题。有研究者指出在其所调查的超大规模学校中,全部存在采用借贷运营的方式来填补经费缺口的现象。有的学校贷款额度巨大,使这些学校的财务安全存在隐患,一些学校领导忙于争取经费,获取贷款,牵扯了大量本该用于提升教育质量、改进学校管理的时间与精力。^[5]上述管理问题客观上使大规模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潜在的安全隐患、金融风险以及可能的社会风险。

(三)冲击区域性教育和文化生态,偏离基础教育改革的价值追求

基础教育要更加体现基础性和公益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高中教育的优质特色发展,以人为本是良好区域教育生态的本质追求,要充分体现各个群体的合理诉求。学校的建设必然要融于社区

的多元化发展,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形成学校内涵建设百花争妍、别具一格的生动局面。然而,城镇地区大规模学校大多是在优质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中小学基础上发展而成,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高标准的办校条件、高美誉的社会知名度和高质量的教育教学,通过“虹吸效应”形成对其他学校生源特别是教师队伍的扰动。有研究指出,大规模重点学校周边的薄弱学校里,有的一个班级只有10至20个学生,有不少教室竟然是空的。^[11]部分优秀教师为获得更好的个人发展和更高的经济收入,选择加入优质大规模学校,也对其他教师产生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学校发展之间的极化现象由此产生,“超级学校”所在之处,区域内的校际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另外,学校作为城市和乡村社会结构中重要的社会组织,是社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支撑。^[12]但大规模和超大规模学校的出现通过影响教育生态进而间接地影响了社区文化生态。有研究指出,社区里的学校对儿童和整个社区的受教育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失去学校,社区就会失去教育仪式,也会失去学校曾充当的社区经济文化要素或经济文化要素的促进性因素。^[10]特别是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学校大规模化,直接导致了乡村学校数量的锐减甚至一些地区乡村学校的完全消失,会在文化生态建设的意义上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三、原因:教育改革特定历史阶段中政府、学校、家庭的行为选择

概而言之,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是特定时期基础教育适应经济社会改革发展需要的历史产物,是内在动机驱使下政府行政主导、家庭和学校参与的耦合性教育资源配置行为。政策倾斜下的重点示范学校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教育优质均衡推进实施三个主要方面构成了直接的动因。

(一)局部与整体权衡,政策倾斜下重点示范高中建设发展的持续性带动

受经济水平和资源总量有限的制约,教育供给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直相对不足,整个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而且,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区域和校际差

异明显^[13],城镇教育水平在数量和质量上总体优于乡村。作为教育供给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但囿于财力不足,财政性经费投入总体上艰难地保障着整个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适应“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迫切要求和高考制度恢复对生源的要求,一批先行“大规模化”建设的重点和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应时而生,其示范效应对政府后续教育供给思路及政策举措也产生了持续影响,并延展到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中。得益于政策倾斜而“一马当先”的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并形成持续的聚集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定历史时期如何将“好钢用在刀刃上”以提高办学效率的问题,同时也拉大了校际和区域教育差异,加剧了基础教育的不均衡不公平。尽管关于重点学校建设的政策后来经历了严肃的反思与调整,但是作为一种处理特殊问题的政策工具运用惯习,在地方政府的教育资源配置中依然自觉不自觉地、潜在而深刻地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不同范围、以不同程度影响着优质学校的大规模化建设。

(二)优化资源配置,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偏差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地方政府在响应和落实国家政策、促进地方教育发展规划的驱动下,配合各种城镇发展规划、教育发展规划积极地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不少地方甚至连续出台快速、大规模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划并强制实施,这为教育资源的聚集和学校规模的扩张提供了充分的外驱力。^[14]数据资料显示,仅2000年至2010年,全国农村小学就从55万所减少至26万所。^[15]同时,学校数量的锐减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区域性学龄人口短时期内大量地流入城镇学校。这也直接造成了城镇中小学校规模普遍扩大。有研究表明,2001—2009年,县镇小学校均学生数由2001年

的463人扩张为2009年的876人,增幅为89.2%。^[16]

根据不同时期人口结构差异在全国层面实施科学有序的学校布局调整是必要的,有利于整个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但由于不少地区对国家政策理解和执行的偏差,以“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性开展“撤点并校”,演进为大范围的“小学进镇,中学进城”的简单化做法,造成“巨型学校”和“超大班额”现象在很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非常普遍。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撤并南部山区学校,在城市建设几所学生近万人的中学,山区的学生都集中在这些学校就读;甘肃省陇东、河西等地区出现学生人数五千以上的中学;^[17]甘肃省某县的小学中,一年级新生一个班的人数最多达到90人,一所小学学生达五千余人。^[18]

(三)外在与内涵并行,家庭对优质教育的追逐和地方政府进行资源统筹

随着“有学上”问题的基本解决,“上好学”成为大众新的更高需求。尤其是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家庭对子女接受更加优质教育进一步重视。一些家长为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千方百计、不惜代价地选择办学条件、师资水平、教育质量、社会声誉更好的城镇优质或次优学校,以及相对农村较好的普通学校。但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成为教育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非理性和不正常的优质教育资源追逐行为也助长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和社会性的教育不满意等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要求“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在此背景下,“集团化办学”成为各地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的举措之一。结合普通高中考试招生改革和义务教育县域均衡国检验收的要求,一体化发展集团办学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施政选择,试图以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方式快速进行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并且在国家层面以行政手段加以推进,从而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众多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教育集团,而其最为显著的共同特征即是组织结构的“大规模化”。

四、对策:审视组织管理规模边界,推动中小学校向适宜规模回归

学校开展有效教育教学活动以何种规模为最佳并无定论,但大量研究表明不同学段学校的建设发展存在着“规模边界”,小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巨大的一定存在问题。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因应时代的变革实现历史阶段性功能的超越,审视学校规模边界进而推动教育本体功能回归,在观念转变、标准完善、科学布局、提升薄弱等方面推进中小学校适度小规模地内涵发展,避免规模扩张由手段向目标的异化。

(一)强化相关决策部门观念转变,深化基础教育和办学改革创新

各级政府关于基础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理念和认知是其科学有效施政的重要因素。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下,地方政府要确保对政策的正确理解、方案细化、有力执行、举措纠偏等,需要观念持续更新和适时转变,科学应对中小学校“大规模化”的问题,引领基础教育领域学校管理的改革创新。

一是充分认识基础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发展性问题。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要与时俱进深化基础教育事业的改革。二是深化对基础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教育新理念、新思想、新观念。尽管中小学校的“大规模化”是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的直接产物,是基于利弊权衡解决特定历史时期教育发展问题的实践选择,但适应新时代基础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扭转“大规模化”异化发展的局面,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新的路向性举措。三是强化省市两级政府统筹管理的认识和执行力度。规范约束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办的中小学校建设发展规模,发挥适宜规模标准的引领作用。将适宜规模纳入县域义务教育质量、学校办学质量国家标准体系中,通过评估考核扭转制约地方“以大为美”的学校建设发展政绩观和教育发展观以及相应的施政行为,约束学校以生均经费为驱动力的学校规模扩张冲动。

(二)尽快完善学校建设国家标准,动态实施中小学校规模的监测评估

现行包含学校规模分城市和农村制定的中小学校建设国家标准,上一次修订距今分别已有20年和15年之久。尽管新的《普通中小学建设标准》已经完成征求意见工作,但还没有按照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予以印发。而且,从部分省市已经出台的地方性中小学校建设标准来看,国家层面学校建设标准的完善已经滞后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实践。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同繁荣、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战略任务要求,对国家办学标准进行系统性修改和完善已然极为迫切。就学校“大规模化”问题而言,一是要在国家标准体系中科学制定符合国情和教育实际的学校适宜规模标准,根据当前教育现实状况和发展目标的变化及时进行标准值的调整和优化。二是借助国家中小学校信息系统建设,围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依照标准进行学校规模的动态监测和评估,也为标准的常态化完善提供数据基础。三是强化国家和地方学校规模标准的使用刚性。对于新建学校,要将适宜学校规模纳入审批过程,从准入上控制超大规模学校建设。对于改扩建学校,要多部门联合加强规范指导,防范出现违规扩大规模。四是出台针对既有大规模学校管理的发展性指导意见。在用地、资金、招生和建分校等行为上进行严格监管。规范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消除潜在的“大规模化”办学隐患和风险。

(三)提升区域教育规划的前瞻性,根据结构性教育需求统筹学校布局

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而言,为促进学校建设的适宜规模良性发展,破解学校“大规模化”和修复区域教育生态,地方政府要强化对科学手段的运用,在土地规划、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教师配备等方面系统性提升区域教育规划的前瞻性,保障区域内教育资源总量的充足和结构趋于合理。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数量及分布状况、人口流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科学制定和实施教育规划与学校布局,在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尤其要对新增人口带来的教育需求增量进行动态研判和科学论证,将包括学校布局规划在内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嵌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19]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编制、国土资源、财政等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也须将学校用地、教师编制、教育经费等要素模块纳入本部门规划之中,实现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和学校布局的“多规合一”,并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等有效的协商机制和通道破除政策壁垒,保证教育规划和学校布局有相应公共资源的支撑,从而既保证在总量上各学段学校承载能力与学龄人口数量相协调,也保证在空间分布上学校布局能够满足学龄人口就近入学的需求,避免由于教育资源总量充足但空间分布不均而引起和强化局部性的学校大规模和大班额问题。在优质教育资源明显不足的地区,以新建、改建、扩建学校等方式增量实施教育资源供给,通过设立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的专项经费、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学校用地预留与划拨,进行经费支出、土地使用和人员配备等方面的统筹,避免盲目的大规模化办学。

注释:

①《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初中阶段学校包含了初级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和职业初中三种类型,前两者的占比分别为69%和31%,职业初中总计只有15所,其占比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由于没有三种类型学校相应独立的教学班数量,此处的计算采取了用教学班的总数除以三种类型学校总数的方式,不能得到不同类型学校较为准确的教学班规模,但能够反映一种总体的趋势特征。

②国家标准分为农村和城市,农村对应于教育统计年鉴中的乡村和镇区(不含城关镇所在地)。因而,此处的国家标准值取农村初中的通常值24。下文的小学阶段也如此处理。

③统计数据显示,教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和镇区。2017年全国乡村教学点数量为9023个,与乡村小学数量的比为1:1;到2020年全国乡村教学点数量减少至79193个,与乡村小学数量的比为0.92:1。

④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顺利完成,我国人口为141178万人。常住城镇人口为90199万人,占比为63.89%[EB/OL].(2021-05-11)[2023-04-13]. <http://www.scio.gov.cn/xwfbh/xwfbfh/wqfbh/44687/45470/zy45474/Document/1703674/1703674.htm>。

参考文献:

- [1]徐晓军,张楠楠.从“单线推进”到“空间协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历程与发展进路[J].河南社会科学,2019,27(12):108-114.
- [2]庞丽娟,金志峰,杨小敏,等.完善教师队伍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思考和政策建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14.
- [3]张烁.努力把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专访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N].人民日报,2019-08-04(5).
- [4]傅维利,刘伟.学校规模调控的依据与改进对策[J].教育研究,2013,34(1):44-52.
- [5]姚继军,陈婷婷.超大规模学校的问题分析与改革出路[J].人民教育,2014(4):30-33.
- [6]金志峰,庞丽娟,杨小敏.编制约束下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困境与政策改进策略[J].中国教育学报,2017(7):53-56.
- [7]李新翠.中小学教师工作负荷:结构、水平与类型[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20(2):82-89.
- [8]孟繁华,张蕾,余勇.试论我国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三大模式[J].教育研究,2016,37(10):40-45.
- [9]高鹏怀,刘继为,李雪飞.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模式、问题与进路[J].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21(7):39-42.
- [10]秦玉友,孙颖.学校布局调整:追求与限度[J].教育研究,2011,32(6):94-101.
- [11]刘先清.办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必须解决“大班额”问题:城镇小学“大班额”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教育学报,2018(S1):47-50.
- [12]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6-81.
- [13]庞丽娟,金志峰,杨小敏.新时期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7(5):109-113.
- [14]杨海燕.大规模高中:三种力量使其规模扩张欲罢不能:对一所万人高中的个案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13(6):39-43.
- [15]郭少峰.多数家长反对,学校将不得强行撤并[N].新京报,2012-07-02(A24).
- [16]万明钢,白亮.“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J].教育研究,2010,31(4):34-39.
- [17]叶庆娜.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大规模学校成因的经济学分析: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视角[J].教育与经济,2013(2):33-37.
- [18]邢剑扬.走出山区“空壳学校”的无奈选择[N].兰州晨报,2009-11-30(A16).
- [19]庞丽娟.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J].教育研究,2020,41(5):16-19.